

自主治理与制度分析理论的进化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轨迹

□樊晓娇 [厦门大学 厦门 361005]

[摘要]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发展了集体行动理论,为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第三种解决方法——自主治理及制度分析理论。这一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使她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探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轨迹,讨论她的学术思想来源、早期的实证研究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分析其自主治理与制度分析理论的进化及其学术贡献。

[关键词] 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 C9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2)01-0007-08

200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诺贝尔经济学奖。鉴于埃莉诺在公共池塘资源领域研究中的卓越贡献,她以女性身份首次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她获奖的著作是《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但是从其最开始的研究和目前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埃莉诺的研究所做出的学术贡献并不仅局限于这一著作。本文通过回顾和分析埃莉诺的学术思想来源、早期的实证研究以及最近的研究成果,力图串联起埃莉诺的学术研究之路以探索蕴涵于其研究著作中的学术逻辑和学术贡献。

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思想来源

众所周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既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丈夫,又是埃莉诺的老师。在埃莉诺开始进行研究生学习时,是文森特的教学给了埃莉诺研究学习的兴趣和研究的方向,最重要的是文森特将他“多中心”的思想传授给了埃莉诺,而这一思想也从埃莉诺的职业生涯的开始贯穿至今,在埃莉诺发表的数百篇学术论文和三十余部学术著作中,“多中心”的思想无处不在。并且此后,文森特和埃莉诺在印第安纳大学共同创建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所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也来源于文森特的研究和思想。追溯到1953年,文森特当时发表了一篇题为《西部的自然资源管理》的文

章,对美国州立法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在文章开始的段落,他就引导读者关注应该就物品的物理性质(即根据美国西部的气候环境和物理特征)来进行征税,并明确指出:“资源管理的主要问题要求超越国家边界的地区性解决方案^[1]”。这一对物理环境属性与制度安排相匹配的关注在研究所和埃莉诺之后发展起来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DA)中处于核心地位。

实际上,“多中心”的思想最早来自于迈克尔·波兰尼。在波兰尼看来:“多中心秩序是与指挥秩序相对而来的,同时,‘多中心’与‘自发的’基本一致,也即是多中心在产生与发展有序关系方面是‘自生的’与‘自发的’,多中心允许个人决策者依据公共制定的法律规则进行自主治理^[2]”。除了迈克尔·波兰尼的“多中心”思想外,文森特“多中心”的思想主要还来自于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在19世纪80年代托克维尔比较了“政府能够管理本地的事务”和“公民为自己做事”两种情况,针对当时美国公共生活的混乱秩序状态,断定“公民的集体力量永远会比政府的权利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并进一步指出法国单中心结构与美国多中心结构之间的基本差异^[3]。这两位学者的思想给了文森特很大的启发,他在“多中心”的问题上发展了迈克尔·波兰尼的学术,认为多中心秩序的“自发性”并非与“建构”无关,而是与满足特定条件的“建构”直接相关。于是在1961年,

[收稿日期] 2012-01-15

[作者简介] 樊晓娇(1984-)女,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

由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人发表了一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大都市区的政府组织：一个理论的探究》，文中介绍了“多中心政治体制”的概念，其基本思路是集体中的任何个人在面临集体选择问题时应该能够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4]。带着这一思想，1962年文森特带领研究生开展了一项关于当地公共经济组织的研究项目，项目的内容是对南加利福尼亚的地下水流域管理情况的调查，主要调查各地下水流域在没有政治司法权时，在与其他地下水流域有相同范围或界线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流域处理（或失败处理）随着增长的人口而减少的淡水这些问题的有效性。这是埃莉诺第一次参与到实地调研中去，并且调查的内容与此后她的研究密切相关^[5]。1963年文森特参加了“*No-Name*”会议，并且这个会议很快发展并创建了“公共选择协会”，“公共选择协会”的创建和《公共选择》的创刊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的开启，而这也成为了埃莉诺此后的主要研究方法——横跨政治学和经济学（也涉及其他社会科学）进行比较制度分析，致力于开发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

二、“多中心的竞争与合作”理论的提出

埃莉诺职业生涯是从1962年跟随文森特一起进行关于美国西部地下水流域管理的调查项目开始的。这是埃莉诺第一次参加实地调研、第一次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途径来思考和分析城市政府^①。在这个调查项目中，埃莉诺负责调查的是西部流域，包括了洛杉矶大部分地下水流域和其他11个城市的地下水流域。在调查中，埃莉诺参加了西部流域水协会的一个常规会议，开始对会议文件的研究，而这一研究后来变成了埃莉诺的学位论文。从这个时候开始，埃莉诺开始理解一些影响当地集体行动问题的核心要素，并在调查中发现当地水生产者和各方组织就西部流域问题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多中心系统，这个多中心系统有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与单中心不同的真正的多中心系统，这个多中心系统包括了美国地质调查局（回应了当地的要求并承担了部分初始研究的基金）、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洪水控制区和大都市水区、11个在早些年争夺水权的城市政府、水生产者代表，还有包括美孚油公司在内的几个大型私人公司，这些组织或企业都在这个系统中承担重要角色，但都不是中心权威。西部流域水协会的一个常规会议使这些承担着不同角色的组织、企业聚集在一起以一种公开的形式共同讨论地下水生产的问题。埃莉诺发现，虽然这个

多中心的系统没有制定出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事实上这个多中心系统比附近其他州的流域更好地解决了许多问题。由此在西部流域形成了“多中心公共企业博弈”的格局，这些研究结果正是埃莉诺后来所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埃莉诺进行西部流域研究的同时，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哈丁的《公地悲剧》（1968）相应问世。通过对西部流域研究与奥尔森著作的对比研究，埃莉诺发现类似的集体行动困境在西部流域案例中有着不同的情况，西部流域的集体行动困境中不存在单一的政府，并且当地公共企业、不同的个人在相互博弈中发展了一种解决方案。由此，从1968年开始埃莉诺将注意力转移到奥尔森和哈丁的研究上，试图寻找集体选择困境的解决之道。

1965年，文森特和埃莉诺一起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刚到布卢明顿的时候，奥斯特罗姆夫妇被一个长期存在的关于大都市组织的政治争论所吸引，这一争论也是此后关于大型公共服务规模调查的源头。1969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大都市区的城市和乡村政府被合并成一个政府，称为“联合政府”，然而这一联合并不完整，几个郊区的自治区选择独立于这项新制度安排之外，这给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比较大型机构与小型机构在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给合并社区和非合并社区的异同。奥斯特罗姆夫妇就此开始了对大型公共服务的研究。1969年到1970年，埃莉诺负责了一个以市政府改革与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规模测量为主题的研讨小组，通过对城市治理与服务供给的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存在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大都市改革（大都市区城市和乡村政府合并）和公共经济（V.Ostrom&E.Ostrom,1965）。大都市改革的倡导者认为，政府规模与公共物品或服务提供的效率及质量成正比；公共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学者则认为，政府规模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效果可能有好有坏，这主要取决于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类型。那些需要面对面提供的服务，如教育、社会治安和社会福利等，政府规模对服务质量的影响是负面的，而那些需要一定的经济规模的，如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服务等，政府规模则起到了正面作用^[6]。为了验证上述两种研究路径的结论，埃莉诺负责的这一研究小组中的成员罗杰·帕克斯（Roger Parks）提出研究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治安服务，埃莉诺通过对当地公共经济和公共服务测量的文献研究后，采纳了这一提议并组织学生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六个邻近社区的警察服务进行实证调查。这次调查发现，通过

比照印第安纳波利斯六个邻近社区警察服务的提供,三个社区中的家庭通过社区中小规模警察部门得到的服务水平更高,在这三个小区中受害率较低,居民对小区警察服务的评价也更高,这与提出较大规模的城市政府总是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这一假设的学者的研究刚好相反^[7]。之后在1970年的秋天,埃莉诺与黑人学生一起调查了两个贫困的黑人社区的警察服务以及与之情况类似的芝加哥三个社区的警察服务。调查发现警察部门规模与警察服务的人均成本之间的明确关系,就如同警察部门规模与家庭受害率的关系一样,警察部门规模越大,警察服务的人均成本和家庭受害率反而越高。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单独的案例中大型中央警察局能够在类似社区服务的多个指标上超越较小的警察部门。由此,为公共经济研究途径的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对于警察服务来说,政府部门规模的增加对于服务提供的水平和效率有着负面的作用。这些案例似乎验证了公共经济研究途径的有效性,但还不能说该研究途径在更大范围内也同样适用。并且,此项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为什么小规模的警察服务可以更有效率地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为此埃莉诺和同事发展了“合作生产”这一概念,他们想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居民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合作生产者^[8]”。因而,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埃莉诺随后展开了对美国200个标准大城市进行分层抽样所得到的80个大都市区样本的实地调查研究。

1978年出版的《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都市警察服务的制度结构》一书是埃莉诺在与其同事进行了长达15年的警察服务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埃莉诺将警察服务当作一个公共经济的产业,然后由此出发,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系统的资料收集和比较分析,用一整套操作化的多中心理论概念框架,详细阐述了美国大都市区警察服务的组织和制度结构,阐述美国大都市区警察机构之间是如何相互帮助、相互合作的。该书的研究思想来源于对亚当·斯密的秩序理论与霍布斯的秩序理论的思考^[9]:斯密的市场秩序理论认为“在一组人们认同的规则之中许多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的努力可能会导致有益的结果。”也即是在一个确定的法律框架下,通过实施产权与契约安排使市场中的各主体进行相互竞争从而产生激励,以达到较优的结果。与之完全相反的是霍布斯的单中心秩序理论,霍布斯认为“自主组织与竞争导致战争状态,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单一权力中心来支配所有的社会关系,并把和平与秩序强加给其他人。”人们的政策方案常常被局限

在这两种秩序理论的框架之中,一旦出现市场失灵,就运用霍布斯的秩序理论,让国家接管市场;而出现政府失灵时,就转向斯密的秩序理论,建议实施“民营化”来由市场接管国家。这两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将思维局限在了两个极端,而不利于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因而埃莉诺认识到:“政治经济学家需要一组比‘一个’市场或者‘一个’国家更为丰富的政策设计框架。”因此,埃莉诺例证了单中心秩序理论假设与现实的相互冲突,提出多中心秩序理论对大都市区公共物品或服务供给的研究思想。1961年文森特等人对大都市区复杂组织的研究认为:“大都市区地方管辖单位的多样化可理解为一种‘多中心的政治体制’。多中心意味着有许多在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他们在竞争性关系中相互重视对方的存在,相互签订各种合约,并从事合作性的活动或利用核心机制来解决冲突^[10]”。在大都市区治理的研究中,不单只有市场和国家和两种秩序,事实上还存在着大、中、小规模的政府和公共企业、私人企业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多中心秩序。在对美国80个大都市区进行比较研究中,得出了三个有实质性经验证据支持的结论:其一,是中小规模的警察机构在生产直接服务方面比较有效(公民获得的服务较好、服务成本较低、绩效更高),并且生活于小规模社区的公民比生活于大都市的公民更了解如何变革地方政策。其二,是小警察机构从大警察机构获得间接服务(间接服务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规模越大越经济)。如果机构能够确立辖区间的契约,建立区域性的设施,并相互交换服务,小规模的机构就能够以低成本获得高度专业化的间接服务,而不必成为充分一体化机构。其三,是大都市区警察机构数量越多越有利于警察绩效的提高。在一定投入的情况下,高度多样化的大都市区的最有效机构与多样化较低的大都市区的最有效机构相比,高度多样化大都市区的产出更大。因而,同等条件下,多样化较高的大都市区的绩效较高,也即由于存在多个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提高直接服务生产者的生产效率。这一系列的实证经验研究和大量系统的数据证明了“合作生产者”的存在以及各“合作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相互合作。并且,这些关于美国大都市区多中心治理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在一个多重和相互重叠的司法管辖区的制度下,公共服务可以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提供,对复杂政策问题而言,当地的解决方案是至关重要的,授权给社区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集体问题具有现实的优势。

有关警察服务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奠定了

埃莉诺的理论(多中心理论)和方法基础(政治经济学),使其得出更为广泛的公共机构之间相互调适的观点,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包括居民在内的合作生产者与公共机构是作为多个竞争者和合作者而存在的,以此发现了公共事务领域中“多中心的竞争与合作”。

三、从实证与实验中发展起来的制度分析框架

人们第一次了解埃莉诺的研究通常都是关于地下水、灌溉系统或森林资源的管理,不会将埃莉诺与大型物品的公共选择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在最开始,她的研究与此有关。正是最开始关于警察服务的研究,启发了埃莉诺将多中心理论作为斯密市场秩序理论和霍布斯单中心国家理论之外的一种替代选择,用于分析和判断与现实中大量集体物品相适应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由此,埃莉诺将其研究重心转回到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上,致力于研究和开发一种理解复杂的人类社会互动过程的分析框架,也就是一种元理论。

1980年秋天,埃莉诺陪同文森特参加了关于“公共部门的引导、控制和执行评估”研究会议,研究会议的交流中,埃莉诺受到博弈论的深刻影响,她与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讨论了制度分析的发展框架以及博弈理论对这个框架的发展。在德国比勒菲尔大学接近一年的学术交流中,埃莉诺接受了交叉学科的思想碰撞,从多个角度研讨和拓展制度分析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了制度分析的方法,这为她接下来几十年大部分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在1982年与拉里·凯瑟尔(Larry Kiser)共同发表的《行动的三个世界:制度方法的元理论集成》一文中,作出了开发共同语言系统的早期尝试^[11]。力求提供一个能够贯穿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于“制度”的定义,发展一个共同的框架来研究包括立法机构、公共部门、市场和其他组织在内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学,以助于把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学者就“制度如何影响个人面临的诸多激励及其个人选择”这一课题所做的研究结合为一体^[12]。

(一)《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制度理性的分析框架初步形成^[13]

20世纪80年代,埃莉诺从研究五千多个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的案例出发,应用制度分析和经验分析的方法,证明了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的存在。^[14]并于1990年出版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该书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对发展由经验支持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理论作出的贡献。该书的特色是把许多新制度主义学者所使用的策略与生物学家为促进从理论上更好理解生物世界而开展的经验研究中所采用的策略结合起来,实现制度分析与经验研究的结合。首先,埃莉诺反思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三个理论模型:哈丁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根据三个理论模型的博弈结构分析,修改了哈丁的牧人博弈来考察以利维坦为解决方案时的四种博弈结果,以及以私有化为解决方案时与自然博弈所面临的种种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从博弈角度探索了理论上可能的处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博弈五,即“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在此基础上,埃莉诺提出了制度分析的框架,以分析委托人自己组织起来解决个人理性所导致的资源退化问题。该制度分析框架明确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集体行动问题需解决的三个问题:1)新制度的供给问题;2)可信承诺问题;3)相互监督问题。指出这三个问题在理论上看似不能由委托人自己解决,但在实践中已存在这种由委托人自己解决的案例,那么如何从已有实践上升到理论层次,埃莉诺指出了制度分析框架中需要认识的一个问题和两组变量。需要认识的一个问题是“公共池塘资源中个人所面临的博弈结构并非是单一的囚徒困境博弈结构,并且面临占用和提供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结构取决于基本参数的值,并因场景不同而不同,所以博弈结构存在且不唯一。”制度分析框架中需加以考虑的两组变量分别是:分析集体行动的三个制度层次;论坛与规则选择、规则执行之间的关系。影响集体行动的制度包括了操作层次的制度、集体选择层次的制度和宪法层次的制度,这三个层次的制度长期影响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行为和结果,并且三个层次的制度作为行动者的行动规则,实际上是一种嵌套关系,比如操作层次的行动规则的变更,是在较之更高层次上的集体选择的行动规则中发生的。制度或行动规则的层次越高,变更的成本越高,则越难以实现变更,在按规则行动的个人之间的相互预期则越稳定。因此需要在三个层次的制度中进行集体行动的分析。其次,是实证案例对集体行动问题需解决的三个问题的回答。通过对瑞士托拜尔、日本平野庄、中生庄和良木庄的高山草场和森林制度,韦尔塔的灌溉制度以及菲律宾桑赫拉的灌溉社群的实证分析,埃莉诺发现这些长期存在的自主组织治理的公共池塘

资源制度的相似之处,归纳了8项原则:清晰界定边界、使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分权制企业。回答了集体行动需解决的其中两个问题——可信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接下来通过美国大洛杉矶地区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的治理规则变迁过程的研究对新制度供给问题进行了回应,发现新制度的供给是在“多中心公共企业博弈”的格局中达到的。最后,埃莉诺初步建立了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制度选择分析框架。按照理性行动的一般理论,影响制度选择的变量有4个内部变量——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这些变量影响任何环境下的个人策略选择。但由于制度分析人员在预测个人策略时,往往难以确定以上总和变量的价值,因此,埃莉诺认为:“在对政策背景进行分析时,必须抛弃总和变量而使用影响总和变量的环境变量。”由此,制度选择分析框架从分析影响总和变量的环境变量开始。该制度分析框架的第一步是分析影响制度总收益的9个环境变量^②、影响转换成本和监督实施成本的两组环境变量^③以及影响行动者贴现率的3个环境变量^④;第二步是在对各环境变量分析的基础上,从社会心理学家对制度选择过程中人类评估特征的实证研究中抽取有用的东西对制度变迁过程中不确定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有根据的评估;然后对制度变迁进行预测,进行制度变迁预测中还需要考虑公共池塘资源运作的外部政治环境的类型,外部政治环境不同也会影响制度变迁。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理论基础,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埃莉诺着眼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大量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或者说是归纳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她把整个治理体制看作是互动的公共机构构成的体制,是一个多元的而非单一的体制。可见,《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的内在学术逻辑围绕着“多中心的竞争与合作”,探索着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

(二)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IDA)——制度分析框架的发展

1993年出版的《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15]一书致力于阐明一种分析方式,以困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维护难题为切入点,比较分析了简单市场、细分市场、用户团体、集权、分权和多中心体制等六种制度安排,并创造性地推出了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即人的属性分析、

物品属性分析和制度安排的绩效评估框架。首先,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对基础设施投资进行个人决策时的选择类型和行动者的复杂决策进行分析;其次,对发展和维护公共设施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再次,对各种制度安排的绩效进行评估,对比分析各种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和失败的原因。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衰败或失灵问题”的根源在于“治理形式的现有结构为从事基础设施发展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提供了一种不良的激励”。而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适当的制度,即要创建一个能带来相对有效和公平的激励体制。通过对五种制度安排(简单市场、细分市场、用户团体、集权和分权)相对绩效的实证分析,发现五种制度安排各有利弊,但都不足以产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的制度激励”。埃莉诺等人认为解决农业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需要有多样化的、分层次的制度:“如果要克服基础设施投资可持续性的约束,就必须建立这些复杂的制度安排;如果需要实施放松其中的一些约束的政策变化,就必须分析替代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的“地方性本土制度”^⑤表明长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治理传统是一种形成有效的、多中心的、公私之间制度安排的社会资本的重要资源,在这些制度安排中,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得以发展。因此,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地方性本土制度”基础上,埃莉诺等人提出了多中心的制度安排,试图以此来促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激励。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DA)主要是为了将存在于所有制度安排中的主要类型的结构变量及这些变量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具有不同的价值进行确认,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制度分析:首先,是划分制度的层次结构;其次,是确认行动舞台中行动情境和行动者各自所包含的变量,根据一定的评估准则来评价这些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和结果。最后,通过在行动舞台上的行动情境和行动者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来分析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结果与行动舞台中行动情境、行动者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二是从结果看影响行动者舞台的三个变量(公共池塘资源的属性、使用者集体或社区的属性、正在使用中的规则),并考察这三个变量是如何影响行动舞台特征的。

1994年出版的《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16]明确提出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并将该分析框架作为整个研究的组织工具。从理论、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场景三个视角出发对公共池塘资源可能

面临的资源利用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首先,是理论视角的研究,以非合作博弈理论作为形式语言,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应用到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分析了提取的外部性、分配问题及监督有关的提供问题,探讨了规则的改变与其对博弈结构和结果的影响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其次,是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的一系列经验研究及其结果,通过对印第安纳大学本科生的投资实验重点考察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提取外部性问题和规则的提供问题。第三个是实地研究视角的分析,分别涵盖了灌溉系统、渔场、森林和地下水流域四个领域。总结了农民所有与政府所有两种不同制度对灌溉系统的影响和世界上使用近海渔场的渔民所开发的制度安排、印度对当地森林资源实现成功治理的自组织乡村制度的执行与制裁机制,以及南加利福尼亚治理地下水流域的制度演进与制度绩效。该书考察了人们在各种不同的公共池塘资源困境下的行为选择,在大部分的公共池塘资源场景中,由于人们克服了过度利用资源的诱惑而摆脱了困境,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一,通过交流达成各方可接受共同协议;其二,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其三,制定措施和制裁机制,并谨慎加强。因而,只有相互信任并愿意采取互惠行动、选择有效交流沟通的人,才能通过自主治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困境。即是说已经建立相互信任与社会资本的人,可以利用这些财富来制定能够避免公共池塘资源困境并实现合理结果的制度。这一“多中心合作”的思想又一次体现在埃莉诺的研究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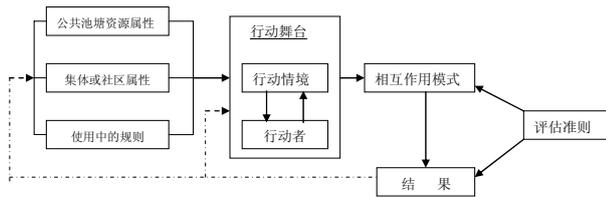


图1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资料来源:改编自Ostrom E, R. Gardner, and J. Walker. Rules, Games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P37.)

2005年,埃莉诺在《理解制度的多样性》一书中,通过描述自己的作品和她的同事及学生如何运用博弈理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科学、人类学形成跨学科的综合体来理解分析制度的多样性,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并对这一框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解释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内涵所在,认为对于“发展(Development)”

的理解不限于普通意义上的人类发展或制度发展,而是指这一分析框架的不断发展和扩展用于更多具体的制度分析中,强调这一框架形成的目的——成为一种元理论、一种共同的语言系统以使不同领域的学者能够进行交流和互动,最终促进学术知识的积累和发展^[17]。

(三) 社会-生态可持续性的总体分析框架(DOSES): 制度分析框架的新发展

在过去三十年里,埃莉诺致力于发展一个制度分析的总体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学者和政策分析家在面临任务时找到方法处理政策问题,这个框架通过引导学者和政策分析家关注规则的具体使用,而不是只把规则的研究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并且引导他们关注公共物品或服务最根本的生物属性和物理属性。在考虑社区的最相关的属性直接受到资源问题影响一样,在埃莉诺目前的研究工作中,正扩展这个框架以使其能涵盖更多连结社会-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理方面。2009年夏季,埃莉诺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用于分析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总体框架》一文,目的是发展一个分析社会-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框架,为诊断理论提供基础^[18]。埃莉诺与欧洲、美国多所大学的学者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同事一起在“分析社会-生态可持续性的诊断本体论”的项目中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框架(DOSES)。将DOSES嵌入到IAD,作为IAD的关键核心部分,用于分析水系统、放牧系统、渔业、城市基础设施、森林资源系统。更广泛跨学科地更新制度分析框架的嵌套,将用于分析理论问题的多层次框架与怎样使多种多样的使用者和资源系统的用途嵌入到治理系统联系起来,研究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个框架包括的多种多样的生态学方法补充了来自于IAD的社会学和制度分析方法。

任何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集体都面临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集体行动困境:在个体有动机去过度开发公共资源为个人谋取私利和在其他努力制定、实施共同规范的过程中搭便车的双重集体困境下,如何才能使可持续地使用关键资源的共同目标得以实现。埃莉诺通过长久以来的实证研究、实验研究和制度分析框架的不断发展,证明了当地社区在面临双重集体困境时进行自主治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而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只有在多中心治理制度的大背景下才能持续,多中心治理可以培养和维持当地社区自主治理的能力。因而,在“多中心的竞争与合作”的学术逻辑下,不断推动着埃莉诺研究发展制度分析框架,力图使IAD更为完善,能够用于解

释和分析更广泛的公共事务。埃莉诺的下一步研究立足于更进一步地发展个人选择理论,将这个理论运用到各种制度安排的分析中,并且最充分地发展理论,明确个人选择理论与IAD和DOSES框架(博弈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是相一致的。而这些研究和发展也同样贯穿于“多中心竞争与合作”的学术逻辑之中。

发展制度分析框架实质上也正是借着对自主治理制度获取的分析来找寻更多或适用性更为广泛的多中心竞争与合作的途径或方法,以解决个人选择与社会(集体)选择之间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到埃莉诺着力解决的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问题。无论是早期的自主治理的实证研究,还是对制度分析框架的不断研究和发展,都力图解决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除国家和市场外,还有埃莉诺提出的自主治理——多元主体(多中心)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

四、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学术贡献

正如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洛马克斯·史密斯(Vernon Lomax Smith)所指出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带来了独特的风格——她在不同方法中运用她的技能,她融合了实地研究和实验室经验研究的方法、经济学和博弈论以及真正重要的科学共同成分。她不断挑战自己的理解,通过寻找新的潜在的相反证据和设计新的实验来挑战她关于新兴历史规则和用于解释这些规则的理论的理解^[19]”。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埃莉诺的学术贡献:

首先,埃莉诺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提供了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条路径来解决个人理性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问题。并且这种解决集体困境的自主治理的路径并非是单一固定模式,而是随着公共池塘资源属性、集体或社区属性、使用中的规则的变化而随之调整变化的自主治理,是多中心、多层次、多样性的自主治理。由此,埃莉诺发展了多中心治理的理论并将该理论贯穿于其所有的研究之中。

其次,埃莉诺与其同事所共同开发并正在不断完善中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为联结各学科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引导各学科学者和研究人员对处于各种领域中的公共池塘资源展开分析,为其找寻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了研究路径。

第三,埃莉诺的学术研究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来说有着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她不单跨越了政治学和

经济学的学科界限,而且跨越了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生物、地理等自然科学的界限,通过实地研究、实验方法、数学建模、统计分析和基于代理的模拟来分析公共池塘资源,从每一种方法或不同视角对共同对象的研究中得到了独特的见解,形成了跨学科的综合体来理解分析制度的多样性。

总的来说,埃莉诺的学术贡献关键在于她对科学严谨性和政策相关性的坚持,以及对经验研究和正式分析的多种技术的开放性使用的一贯坚持,这些使得埃莉诺成为一个“学者企业家(scholar entrepreneur)”的典范^[20],在她的学术生涯中发表的数百篇论文和三十多部著作吸纳了前沿的各种方法,开创性地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界限、方法界限进而促进了学术进步。

注 释

① 1962年,埃莉诺第一次参加了教员和高年级研究生的研究讨论,并就文森特1961年发表的《大都市区的政府组织:一个理论的探究》一文进行了几次讨论。

② 影响制度总收益的9个环境变量是:占用者人数、公共池塘资源规模、资源单位在时空上的变动性、公共池塘资源的现有条件、资源单位的市场条件、冲突的数量和类型、这些变量资料的可获得性、所使用的现行规则以及所提出的规则。

③ 影响转换成本的环境变量有:决策者人数、利益的异质性、为改变规则所使用的规则、领导者的技能和资本、所提出的规则、占用者以往的策略和改变规则的自主权、当地占用者以往的制度决策以及外部政府所制定的要求。而影响监督和实施成本估价的环境变量有:公共池塘资源的规模和结构、排他技术、占用技术、市场安排、所提出的规则以及所使用的规则的合法性等。

④ 共有规范以及其他机会评估也通过影响当事人的贴现率从而影响制度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这里有3个环境变量:一是居住在公共池塘资源附近的占用者;二是各种情形中的全部占用者;三是占用者获得有关其他集会的信息的可能性。

⑤ 地方性本土制度是指发展中国家在一定地域内由民间自发形成的为社会所承认的非正式基层治理制度。

参考文献

[1] OSTROM V.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West[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3, 47(2): 478-493.

[2] 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治道与发展[M].上海:上

海三联书店, 2000: 75.

[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4] OSTROM V, TIEBOUT C M, WARREN R. The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 a theoretical inquiry[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1, 55: 831-842.

[5] OSTROM E. A Long Polycentric Journey[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Forthcoming, 2009,(1):4.

[6] 蔡晶晶.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构建[J].东南学术, 2010, (1): 49.

[7] OSTROM E. Metropolitan reform: propositions derived from two traditions[J]. Soc. Sci. Q. 1972, 53(3): 474-493.

[8] PARKS R B, OSTROM E. Complex models of urban service systems[C]//In Urban Policy Analysis: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1: 171-99.

[9] 奥斯特罗姆, 帕克斯, 惠特克.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1-11.

[10] OSTROM V, TIEBOUT C M, WARREN R. The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 a theoretical inquiry[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1,55: 831-842.

[11] KISER L, Ostrom Elinor. The three worlds of action: A meta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C]//Ostrom Elinor.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Inquiry. CA: Sage,

1982: 179-222.

[12] OSTROM E. A Long Polycentric Journey[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Forthcoming,, 2009,(1): 12.

[13]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14] 张克中.公共治理之道: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理论述评[J].政治学研究, 2009, (6): 84.

[15]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拉里·施罗德, 苏珊·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16]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罗伊·加德纳, 詹姆斯·沃克.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M].陕西: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17] OSTROM E.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M].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 OSTROM E. A Long Polycentric Journey[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Forthcoming, 2009,(1): 18.

[19] SMITH V. Commentary: governing the commons [EB/OL]. [2009-10-12] Forbes.Com, October 12.2009. <http://www.forbes.com/2009/10/12/elinor-ostrom-commons-nobel-economics-opinions-contributors-vernon-l-smith.html>.

[20] MICHAEL D. McGinnis • James M. Walker. Foundations of the Ostrom workshop: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olycentricity, and self-governance of the commons[J]. Public Choice ,2010,(2): 299.

Evolution of Self-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heory —Logic Route of Elinor Ostrom's Academic Ideology Development

FAN Xiao-jiao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Elinor Ostrom developed the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which provides the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with the third solution—called the Self-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heory. Because of this outstanding academic contribution, s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 This paper tries to seek for the logic rout of Elinor Ostrom's academic ideology development, discusses her ideology's sources,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early period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finall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Self-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heory and its contributions.

Key words multi-cores; self-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编辑 范华丽